

返鄉、扎根與再連結—— 成年初顯期阿美族青年的 文化回返與社區參與

陳翠臻Sawmah.Lasong、劉柏傳Kilang、曾梅玲Cihek.imay

壹、前言

Arnett (2000) 提出「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 概念，指18至25歲介於青少年與成人之間、仍持續探索自我定位與生活方向的生命階段。對多數原住民青年而言，這段探索歷程往往伴隨著「離鄉」與「返鄉」的生命移動：為了求學、就業或生活條件而離開部落，進入都市社會；之後，再於成長與自我認同的辯證中，重新思考「回家」的意義。

但是，離鄉過程中，原住民青年不僅需面對在教育與職場中遭受的族群刻板印象與社會適應壓力（許木柱，1987；傅仰止，1993；曹婷婷，2020），不少人亦在回到部落時遭遇身分歸屬的再檢視：曾在都市被視為「有特殊資源的原住民」，卻在部落反被看作「外地回來的人」，形成內外夾擊的認同困境（Ciwang Teyra等人，2022）。返鄉青年口述「我想真正知

道自己是誰」、「不想只擁有原住民血統，卻不夠認識自己的文化」，顯示返鄉不僅是一種地理位置的回返，更是一種文化召喚與自我和解的過程。然而，返鄉並非浪漫的歸途。返鄉青年往往同時面臨到就業與生計的不穩定、家庭角色與期待的再協商、語言與文化重新學習的焦慮，以及在社區中重新被「看見」與被評價的壓力等挑戰。

2025年9月，花蓮光復鄉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受災，使這些挑戰更加明顯。災後的部落不僅面臨農地受損、通行受阻與居住空間重置，也承受集體不安與未來生活形式的再思考。在此情境中，返鄉青年扮演了關鍵的社區行動者：協助長輩理解政策資訊、組織物資與清理工作、陪伴受災家戶、並參與文化儀式與土地關係的再建構。他們以自身身體、語言與關係網絡，重新接起家園的斷裂。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研究場域

設定於花蓮縣光復鄉之阿美族部落，以場域導向（field-based）之研究設計，探討特定族群文化脈絡下返鄉青年的生命經驗。研究對象之選取採立意取樣，取樣標準包括：（一）正處於成年初顯期階段；（二）曾因求學或就業長期離鄉，後實際返鄉生活；（三）返鄉後持續參與家庭、文化或社區實踐行動，能夠回應本研究「返鄉適應與文化經驗詮釋」之研究提問。本研究實際納入分析之受訪者為8位返鄉阿美族青年，所有受訪者皆為實際生活於該研究場域，並經歷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之災情波及。研究並未進行跨族群比較，僅聚焦於阿美族群，以避免不同原住民族之文化制度、家族結構與社會組織差異造成分析混淆，並提升研究詮釋之脈絡一致性與深度。資料蒐集方式包含長期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所有受訪者皆能提供完整之返鄉生命敘事資料（研究受訪者一覽表請見附件一）。

本文旨在探討：

- （一）青年返鄉背後的自我認同與文化尋回歷程；
- （二）災後情境中返鄉青年在家庭、生活與社區層面，如何影響文化回返得以持續展開；
- （三）青年如何透過行動成為家族、部落與土地再連結的力量；

（四）社區及公部門如何形塑支持返鄉青年的友善環境。

返鄉，不僅是回到「我們從哪裡來」，更是回到「我願意成為誰」。在成年初顯期，返鄉青年透過行動重新與部落連結，也在回家的過程中，重新長大。

貳、文化缺席到文化召喚：成年初顯期阿美族青年的返鄉動機與認同生成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是個體心理上在某種特定文化群體中，產生連結並逐漸衍生出個人自我概念和自我認知的一部分，進而影響個體對自我的評價及對外界關係，在經歷諸多對話與探索後，形成明確的文化身分認同後，接受和認同自己的文化歸屬感（Phinney, 1990）。Anderson（1983）指出，個體基於對歷史脈絡下的宿命感，因此會產生出一種族群認同，而認同也會牽引個體回流到有安全感、歸屬感的土地、群體中生活。所以，返鄉不僅是一種空間位移，更是一場「回到哪裡、成為誰」的生命追尋。本文之研究主軸在於探討成年初顯期阿美族青年如何在返鄉歷程中，透過文化實踐與社區行動，逐步生成文化主體性，並在結構限制下轉化為具行動能動性的社區參與者。

一、離鄉經驗加深與文化、土地再次連結的渴望

對於某些阿美族青年而言，成年初顯期不僅面臨普遍的發展任務，還承受族群文化延續與現代社會適應的雙重壓力。許多原青即便自小離開母體社群與土地，但仍與家族成員保持良好互動，導致其無論是情感連結或是文化責任，都存在返鄉的動力。青年M從小在部落生活、就學，直到高中時期因家庭因素不得不離開部落到臺北就學，因為本身成績亮眼，順利升上第一學府，爾後也開啟急促忙碌競爭的都市人生活步調節奏一路到大學畢業，這期間不只身體與部落物理上的距離變遠，自己的心離文化母體也更遠了。雖然頂著原住民的身分但在自己心裡深處不時都會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浮現，甚至更會遇到來自身旁同學的質疑，以及自己對於母體文化的認同疏離感，這樣多重複雜的情感，讓青年M進入大學生活後，更加用力地回頭尋找自己文化的根源。不論是開始參與原住民族相關社團以及活動，或是在大學畢業後回歸參與部落文化事務相關工作的推動，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踏在走向自身族群與文化認同回家的路上，用身體力行的行動實踐自己渴望與土地親近、連結的想望。「我雖然是在外面漂流，但我想要當真正的阿美族，在我大學時在參加一個原住民學生營隊時，我就這樣對著大家大聲喊出心中的聲音，而我現在正持續在這條

路上走著！」（青年M，女，20180712）

青年L也以「飢餓」比喻文化缺席帶來的靈魂枯竭：「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餓很久的人，看到食物就會很本能性地衝上去拼命吃飽。我們以前在外面，太缺乏和阿美族文化相連結的活動或是聚會了，整個就是乾掉，沒有靈魂，所以現在回來就很多想說母語，什麼活動、什麼祭典都參加，什麼環節都努力搞懂，就是不想再當一個沒有靈魂的人。」（青年L，男，20250927）離鄉經驗反而強烈喚起文化回返的渴望，使返鄉成為「重新找到自己」的重要途徑。

二、承擔文化傳承使命感的喚醒

青年K從小就是棒球隊的翹楚，甚至曾一度當選國家隊選手，但後來因為身體受傷被迫放棄自己曾經深愛的棒球運動，因著許多失落難過而長出憤怒，隨後的成長歷程裡不斷地衝撞各種社會規範與生活教條，讓家人、學校都頭痛不已。青年K高中階段回到母體社群，選擇加入阿美族的年齡階層，起初他只是因為覺得參與年齡階層很帥，「慢慢的在裡面經過兩年的歷練後，突然有一種感覺與聲音湧上，那個聲音叫我『扛起肩上文化的擔子』。扛起文化的擔子，是青年K來自生命深處的呼召，也選擇回應並繼續踏在回家的路，此後便逐步參與文化傳承種種活動。跟著年齡階層的Selal（註1）共同籌劃年祭前的

籌備工作，學習阿美族傳統技藝和傳統知識，甚至於在他大四實習課程中選擇回到部落跟著部落族語老師學習，主動跟家人商量和爭取完整參與從年祭前期籌備、Patakos (註2) 到奇美部落報訊息，在年祭的種種儀式行動中可以看見他的身影，甚至在自己後續學校專題裡規劃著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包括Pangcah (註3) 的獵人文化透過進入獵徑、尋找獵物、完成打獵以及製作成標本等等，讓自己繼續走在成為一個人的路上。

對部分青年來說，文化流失並沒有太多的自覺，反倒是部落長輩、家族親人的耳提面命，才讓他們頓然發現自己早已錯過許多。有青年提到：「離開部落之後，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去想自己是阿美族人這件事情，但我外婆過世前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她說『Aka kapawan, o wawano pangcah kiso.』(註4)我整個人像被打醒一下，那句母語像雷電一樣劈到我的腦袋，才驚覺說自己被溫水煮青蛙，怎麼忽略自己的文化身分那麼久」(青年A，女，20250928)。返鄉如同回到母親懷抱一般，是重新參與文化實踐、土地連結、傳承祭儀，與建立社會網絡的機會，文化歸屬感成為返鄉動機的重要驅動之一(黃昱軒，2019；鍾令旋，2020；廖慧雅，2022；蔡舜寧、李幸長，2025)，返鄉不僅是個體在空間移動，更是對自身文化根源的一種回應與實踐。無論是家族的情感

拉力，或是文化使命的召喚，這都引動成年初期的原青有著返鄉的念頭，認為建立家族情感連結、承擔文化義務或投入部落事務是應盡的責任，但事實上離開既有的都會區社會網絡，承受未知的生活挑戰與環境適應卻也成為另一種推力。

對成年初顯期的阿美族青年而言，返鄉不只是向後回望，而是在生命探索中向「根」前進。離鄉經驗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缺了什麼」；而返鄉，是回到能讓自己「再次長大」的地方。然而，返鄉並非終點。回家之後，青年仍需面對就業、生計、家庭角色調整與社區再定位等現實挑戰。以下聚焦於返鄉後的「扎根與再連結」歷程，解析青年回到部落後仍需面對現實層面的生活挑戰與家庭適應。

參、返鄉之後不只是回家：文化回返歷程中的生活與家庭結構限制

承續上述，成年初顯期阿美族青年返鄉，往往源自文化缺席所引發的認同召喚。然而，返鄉並不必然等同於文化回返的順利展開。相反地，青年在返鄉後往往首先面對的，並非文化實踐的展開，而是一連串生活、家庭與結構層面的適應壓力。Bowen (1978) 指出，家庭是由家內成員之間互動所交織而成整體系統，成員間存在某種微妙的融合和個別的推力，個

體的表現深受家庭系統相互連動之外，社會文化脈絡也會對個體產生出社會感情歷程（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交揉出家庭情感交織與行為影響。阿美族青年返鄉不僅是生活環境抽離了原本的舒適圈，更意味著要接受角色變動，因此返鄉後的實際景況就面臨不少家庭適應與生活挑戰。本節不僅把這些經驗僅視為「返鄉後的生活困境描述」，而是將其視為文化回返歷程中關鍵的結構性限制條件，分析這些條件如何影響青年是否、以及如何能將文化認同的召喚，轉化為可持續的文化實踐與社區參與行動。

一、生活挑戰

（一）就業不足與低薪的壓力

就業與生計穩定性，是返鄉青年能否將文化回返付諸實踐的首要結構條件。對多數受訪青年而言，返鄉並非只是回到熟悉的文化場域，更意味著必須在有限的地方產業結構中重新配置生活資源。當經濟壓力持續存在時，文化實踐往往被迫退居次要位置，使文化回返難以成為可長期投入的生活狀態。花蓮地區整體產業以觀光、服務與農業為主，長期受限於區域發展與產業結構，使得薪資水平普遍偏低。根據花蓮縣政府的「花蓮縣統計資訊服務網（註5）」顯示，花蓮縣整體薪資僅略高於基本工資，且多集中於技術與勞力型工作。第二作者在一次中心進行「部落美男

子團體」（針對部落退休高齡男性）時，其中一位Faki（註6）：「最近煩惱的事就是小孩說要回來，這裡就業不好找，幹嘛回來！」從這裡可以窺看出青年當在選擇在回部落前首先須要承擔與面對的壓力。對返鄉青年而言，「回家」意味著不僅要承擔理想，更要面對現實的經濟挑戰。特別是返鄉務農的青年更直接暴露於天災風險之下。「天災一發生我就死定了，不只農作物死，我們全家也跟著往下（掉）了，作農本來就是良心事業，沒有賺多少，完蛋了，這個馬太鞍溪堰塞湖事件一來，就是，我傻眼了！」（青年D，男，20251024）這樣的經驗顯示，返鄉務農雖承載著對土地的情感與文化實踐的理想，卻也面臨極高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天災不僅影響農作物產值，更直接動搖家庭的經濟基礎與未來發展。除此之外，青年懷抱返鄉的理想時，不僅需要面對現實的經濟疲弱的困境，交通、醫療與教育資源相對缺乏的結構性因素，更加深返鄉生活的成本與壓力，也影響青年對家庭發展的無奈。

（二）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不足

除了經濟壓力之外，公共資源的可近性，深刻影響返鄉青年是否能在文化回返的同時維持基本生活運作。交通、醫療與教育資源的不足，不僅提高返鄉生活的實質成本，也形塑青年對「是否能在

部落長期生活」的現實評估，進而影響其對文化實踐與社區投入的可能性。有青年說道：「公車班次那麼少、晚上也沒有車會開進來部落，不管是去工作搭車、看醫生或是帶小朋友去上學都很麻煩也很有壓力」（青年Z，女，20250825）。對不少青年而言，因為居住於部落，交通出入都需要仰賴私家車每日來回奔波，公共資源的不足讓交通和生活成本都顯著增加，也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特別是醫療資源的缺乏，更是青年們的痛點。「整個花蓮縣像樣的醫院就只有兩間，每次老人家或是小朋友生病就要往花蓮市區跑，然後又要等很久，全花蓮的人都要排隊等，大病也等，小病也等，時間成本都耗掉了」（青年L，男，20241121）。由此可見，花蓮的醫療短缺也是返鄉青年所詬病的，不論是硬體設施設備，或者軟體的專業醫療人員，都呈現嚴重不足，所以當家人需要進行較為精細的檢查或治療都需要移動到花蓮市區的大型醫院。偏鄉地區在交通、醫療、教育與網路基礎建設等方面常存在落差，影響青年發展與生活便利性。對曾在都市習慣了多元資源的青年而言，這是一種必須重新適應的生活現實。

（三）生活作息與價值觀落差

返鄉青年在文化回返歷程中，亦需重新調整其生活節奏與價值實踐方式。長期在都市生活所內化的時間感、社交模式

與自主性，與部落日常生活中的集體規範與長輩期待產生落差，使青年在文化認同尚未穩固之前，便先面臨行為被評價與角色被規訓的壓力。「以前在臺北，大家夜唱很正常呀！現在回到這裡，和朋友唱到嗨的時候，家裡就來電話了，感覺好像我又怎麼不循規蹈矩了。」（青年D，男，20251021）。這種生活節奏與價值觀的落差，實際上是兩種生活世界的碰撞，對青年而言，都市生活中的夜間活動是社交與放鬆的行為；但在部落長輩眼中，夜歸或晚歸常被視為不安分、不成熟的舉動。顯示出當青年重新回歸到母體文化場域時，必須在自由與責任、個人與群體之間重新協調與定位，生活作息與價值觀的落差不僅是生活習慣的挑戰，更反映了返鄉青年在文化身分與生活選擇之間的內在拉扯。

綜合而言，返鄉青年在生活、家庭與結構層面的多重壓力，使文化回返並非自動生成的歷程，而是一段高度脆弱、隨時可能中斷的實踐過程。然而，正是在這些限制條件之中，部分青年逐步發展出因應策略，透過同儕連結、行動轉譯與角色再定位，使文化回返得以轉化為具體的社區行動。下一節將進一步分析，返鄉青年如何在結構限制中，成為地方實踐的行動者。

二、家庭角色再定位：文化回返在家庭系統中的受阻與調適

返鄉青年的文化回返，並非僅是個體的認同選擇，而是深嵌於家庭系統之中的互動歷程。當青年回到部落生活，其文化認同的實踐往往立即與家庭角色期待、照顧責任與世代權力關係交織，成為文化回返是否得以穩定展開的重要結構條件。本小節從家庭系統觀點出發，分析返鄉青年如何在家庭角色再定位的過程中，經驗文化回返的受阻、協商與調適。

（一）文化責任過早加諸的張力

返鄉青年在文化回返尚未穩固之際，即被家庭與部落視為文化承擔者，顯示文化回返並非循序漸進，而是可能在家庭系統中被快速「角色化」。當青年決定離開都市回到部落時，往往背負著來自家庭與文化傳統的多重期待。返鄉青年們常需要額外肩負起部落相關公共事務的責任和壓力，面對部落超高齡化以及人口外移嚴重的現況，除了平時開始參與一些部落會議，更在年祭前一兩個月便啟動很多前置作業的籌備工作，青年K：「年祭開始前身體便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部落的」（青年K，男，20250810）這句話背後，反映了族群文化中對社群延續的重視，更意味著要重新進入傳統的社會結構與角色秩序。青年A曾表示提到：「每次部落長輩們都說，『這是你們年輕人要做的呀！

那是你們年輕人要傳承的呀！』說真的，不是不願意去承擔這樣的期待，但是我懂得還很不夠，就吸的水（文化養分）還不夠嘛！」（青年A，女，20250928）。返鄉青年所面對的挑戰，並非僅止於經濟或生活問題，更是一種角色能量的尷尬。他們在家庭與文化的期待中尋找歸屬感，但由於文化能量的斷層導致在「傳承」與「角色期待」之間尚未平衡，也就是面臨「還不會跑，怎麼能飛」的窘境中，這的確儼然已經成為返鄉青年在新世代部落脈絡中最尷尬、也最關鍵的課題。

（二）文化倫理下的照顧結構壓力

親屬關係的重新編織，既是文化回返的重要條件，也成為青年需付出高度情感勞動的結構壓力來源。許多年輕人返鄉後被家人視為主要照顧者，需同時照顧年邁父母、協助關照部落內的其他親屬，維持家中經濟開支。但在就業機會有限、公共資源不足的環境下，他們所背負的家庭期待令他們備感沉重外，照顧一旦被視為理所當然，卻鮮少有人關心他們自身的情緒與未來時，身心俱疲的挑戰也隨之而生。「回來後，我是基於孝順和責任感，所以我願意照顧家人，但好像莫名其妙會覺得被理所當然了，我有一種不被理解的壓力存在」（青年Z，女，20251004）。

陳翠臻（2024）指出，返鄉原青不時在家庭期待的角色中感到壓力，特別是當

家裡發生天災或健康議題時，所需投注的資源需要由全家族共同承擔，但也因此會牽動家族其他成員的分工與資助，基於家族資源共享共生的倫理教育，家族成員的分工協調需尋求更多家人共識來達到資源重新配置與互補支持。青年A曾多次在聊天中透露，回鄉後常同時背負家務照顧、情感支持與部落參與等多重角色，她在傳統文化中被期待成為連結家庭與社群的橋樑，卻也因此承受更大的心理與生活壓力，而這樣的任務特別在女性青年身上更為明顯。整體而言，「家庭照顧分工」在返鄉情境下不僅是一項實務工作，更是一種文化負擔與身分考驗。青年在盡責與自我實現之間的拉扯，成為返鄉生活中最難以言說的壓力來源。

（三）文化回返中的關係再定位

親屬關係的重新編織，既是文化回返的重要條件，也成為青年需付出高度情感勞動的結構壓力來源。離鄉期間關係疏離，返鄉青年回到熟悉卻又陌生的家族網絡中時，必須重新協調的情感與社會互動關係，重新建立互動模式。青年A提到：「小時候跟叔叔、阿姨們都很親，很多話可以聊，現在回來反而有點卡卡的，不知道要怎麼聊天」（青年A，女，20250928）。長期在外求學及工作，讓他與部落親屬的互動大幅下降，關係逐漸生疏。返鄉後，青年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在熟

悉卻陌生的家族網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理解不同世代之間的溝通方式與互動邏輯。「在部落，有長輩們遇到我都會問：『你是誰家的孫子？阿公阿嬤叫什麼名字？你住在哪一村？』這是在部落中常見的問候語，但我每次回答都覺得很不好意思，表示我消失太久了」（青年K，男，20250903）。由此可見，親屬網絡是社會互動的基本引線，象徵著「關係連結」與「共同生活」的價值。然而，對返鄉青年而言，這樣的關係既暖心又存在壓力。親屬關係再連結考驗著青年的家族融入，也牽動其對「家族」意義的重新理解，強調青年的返鄉之路不僅是回到熟悉的土地上找到歸屬感，更重要的是再次定位個體在家族、社群中的位置。

肆、從文化回返到社區行動： 返鄉青年如何成為地方實踐的行動者

本研究發現，返鄉青年在家庭系統中需面對角色期待、照顧責任與關係再定位等結構性壓力，使文化回返並非線性或穩定的歷程。然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家庭系統不僅是文化回返的受阻場域，同時也可能成為青年行動能動性生成的重要轉化節點。對部分返鄉青年而言，家庭所加諸的文化責任與照顧期待，雖在初期造成高度壓力，卻也在持續協商的過程中，

逐步轉化為行動的正當性來源。當青年開始以實際行動回應家庭與長輩的期待，例如投入祭儀籌備、協助部落事務、承擔跨世代溝通角色，其文化實踐不再僅是個人認同的表現，而是被家庭與社群「看見並承認」的公共行動。此一「被承認」的過程，成為青年跨出家庭場域、進入社區公共實踐的重要中介機制。

此一轉化歷程顯示，家庭系統在返鄉青年的文化回返中，並非單向施加壓力的結構，而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關係網絡。青年透過行動重新界定自身在家庭中的位置，使文化回返得以從「尚未準備好的承擔」逐步轉化為「被允許、被信任的行動角色」。也正是在此過程中，返鄉青年得以跨越家庭與社區之間的界線，成為連結家族、部落與公共行動的關鍵行動者。本節將從返鄉啟動、行動策略與家庭文化再平衡三個面向，探討返鄉青年如何在社區中扎根並展現能動性。

一、返鄉行動的啟動：同儕社群作為支持網絡

返鄉生活前，許多青年會以評估經濟平衡及就業穩定為前提，畢竟在浪漫情懷與使命任務的催促下，如何避免自己陷入經濟困境，或是減少部落家人對子女返鄉後生活起居的擔憂，都會是很重要的面向。第二作者表示，在與部落返鄉青年對話中提及：「在近三年有較多的青年

陸續返鄉，可能因為在五年前有幾位青年先行回到部落生活，大家都會觀望，也在看回到部落的先行者看起來還蠻能夠生活的；再加上部落端也會分享相關就業資訊等，可能是近三年讓返鄉的部落青年數量增加的可能原因」（青年C，女，20250814）。返鄉青年會帶著自己過去在學校或是都市工作的經驗和能力返回，但是部落現場的就業機會並不一定符合，所以青年便會透過在部落青年社群持續相互聯繫與聚會，過程中除了得到許多情感上的支持甚至就業資訊。曾有部落青年向他表示：「很感謝有部落青年M她們來找我，不然剛回來的自己對於自己的文化很陌生，不知道可以從何開始學習；還有青年C也會分享臨近學校代課的資訊，讓自己原本開的餐食店在收入還不理想下還能夠有機會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青年H，女，20250805）；也有部落青年採用住在部落然後選擇接跨區的計畫案子進行工作增加自己就業的機會。

近年來返鄉人數的增加，與先行返鄉青年所展現的「可行性示範」高度相關，同時，返鄉青年之間形成的互助社群，成為關鍵支持力量。他們透過聚會、社群媒介與口耳相傳交換資訊，包括：臨時或兼職的工作機會、學校代課、計畫人力等公部門職缺、地方展演、文化活動與語言學習資源等。此類同儕支持網絡顯示：返鄉不是個人行動，而是一種社群行動，青

年透過相互扶持共同「讓彼此能在家生活」。

二、行動策略的多元實踐：結合都市技能與在地創生

長時間旅外生活的青年可能承襲較多都市的時間節奏、生活便利性與當代價值觀，返鄉後需適應部落相對緩慢的生活步調、舊有觀念與傳統規範。這種落差可能導致代際衝突，例如對工作運作的調整、婚姻時機、財務決策與管理或文化參與方式的不同看法（何立民，2006；黃昱軒，2019）。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返鄉青年妥善運用先前在外地生活習得的經驗，轉化成創新發展的基底。例如，有青年結合當代習得的專業技能（如餐飲管理、設計行銷、資訊科技等），搭配在地傳統知識、文化與自然資源，開發具原住民地方特色的社區發展與經濟模式，如無菜單料理餐廳、部落導覽、婦女農產銷售、在地食農教育等。此類結合「都市經驗與原鄉文化」的行動策略，不僅提升了青年在部落中的自我價值感與存在感，也提供了部落經濟多元化的新可能。

此類「都市經驗的再轉譯」讓青年不僅重新建立自我價值，也為部落帶來新的經濟可能性與更可被青年世代理解的文化入口。行動上的多元實踐更需建立在部落內部支持系統的形成，包括共同享有資訊取得的管道、教育訓練的機會、行銷宣

傳的平臺、跨縣市展覽的機會，以及青年社群的情感交流互動場域。藉由這些正式或非正式地交流管道及訊息流通，能更加深返鄉青年的部落使命與身分認同，進而強化實踐理念的動力，有助於他們取得部落族人共識與對話空間。由此可知，「都市經驗的轉譯與在地實踐」成為返鄉青年文化適應與經濟穩定的有效策略（蔡舜寧、李幸長，2025），不僅原住民青年的文化能動性與創造力得以開展，更為原鄉地區注入更符合被大眾認識、接受的創新局面，有助於推動地方創生與部落永續發展。

三、家庭與文化的再平衡：在期待與自我實現之間

承接前述家庭系統作為行動轉化場域的分析，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離鄉的生命經驗讓部分阿美族青年不時面臨到文化缺席（sense of cultural absence）的失落感。在都市生活，由於缺乏熟悉的族語使用情境與文化儀式洗禮，導致對文化承襲有了認同又疏離的交揉情緒；同時，也不時承受了有形、無形的族群歧視或刻板印象，促使他們直接、間接地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族群身分，並渴望回到能夠被理解與接納的社群當中（何立民，2006；Ciwang Teyra等人，2022）。文化認同是牽引返鄉青年投身部落重要推力，這是不容質疑的，然而，青年們往往需擔負家庭與部落

所賦予的社會角色期待，包括照顧親屬間較為年邁長輩們、參與文化祭儀傳承與承擔社區公共事務責任等。這些責任雖源於對文化的認同與歸屬感，卻也可能與個人職涯發展、生活安排與自我實現的路徑產生張力。返鄉，對部分青年而言，逐漸從文化「召喚」轉化為某種「義務」，甚至是無形的社會壓力。或者，當返鄉青年欲嘗試創新營運模式與策略時，有可能會遇到習慣舊有經營模式的長輩們給予質疑或不支持，導致青年在原先期待與自我實現之間出現拉扯。

由此可知，返鄉青年在家庭與文化之間進行的，呈現一種動態的再協商與再定位，過程中也重新定位返鄉青年在社群當中的新角色與任務。從家庭系統觀點出發，返鄉青年作為系統中新的行動節點，其文化實踐也潛移默化地促進整個家庭與部落在觀念與生活實踐上的調整與對話。長輩的角色不再只是文化傳授者，也開始學習聆聽青年聲音，形成跨世代之間的「文化再平衡」，這正是返鄉行動最可貴之處。

整體而言，返鄉青年不是回到部落「被照顧的人」，而是正在形塑部落未來的人。他們透過結伴而行的青年社群、都市經驗的再在地化轉譯，以及在家庭與文化之間的協商，逐漸成為文化再生、社區連結與地方創生的重要行動者。

伍、討論與政策實務意涵——文化回返作為一種行動化歷程的再理解

本研究以成年初顯期阿美族返鄉青年為例，發現文化回返並非返鄉後自動生成的結果，而是一段在家庭系統、生活結構與社區場域中，透過持續協商與行動逐步形塑的歷程。返鄉青年能否從文化認同的召喚，進一步轉化為穩定的社區參與行動，取決於多重結構條件是否得以被支持與調整。從家庭系統觀點（Bowen, 1978）而言，返鄉青年作為新行動者的加入，促使原有家庭與社群互動模式重新調整；而文化認同理論（Anderson, 1983; Phinney, 1990）則揭示返鄉行動源於深層的文化歸屬與自我定位需求。本研究補足 Arnett（2000）在「成年初顯期」概念中對少數族群文化脈絡關注之不足，顯示阿美族青年在此階段同時承擔「自我探索、文化再連結、家庭系統再平衡」的生命任務。此一過程不僅是個人生命的轉折，更具社區再生與政策治理的意義。以下分別就政策層面與社區實務層面提出討論與建議：

一、政策層面：支持文化回返「得以行動化」的制度條件

(一) 從「返鄉補助」走向「返鄉歷程支持」的整合模式

本研究發現，返鄉青年在文化回返初期，往往面臨就業不穩定、生活成本上升與家庭照顧責任交織的壓力，使文化實踐難以成為可持續的生活狀態。因此，政策介入不宜僅停留於一次性的返鄉誘因或短期補助，而應轉向支持青年在返鄉歷程中的多階段需求。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建立「返鄉青年整合支持平臺」，結合就業媒合、跨區工作彈性、計畫型人力資源、心理支持與家庭協商機制，降低青年在文化回返初期的結構風險，使文化實踐得以累積而非中斷。

(二) 將家庭系統納入返鄉與文化政策的關鍵支持單位

研究顯示，家庭系統既可能成為文化回返的壓力來源，也可能在角色協商後轉化為青年行動正當性的關鍵場域。然而，現行返鄉與文化政策多以「個人」或「社區」為單位，較少關注家庭層次的動態影響。建議在原鄉青年政策、文化傳承計畫與災後重建方案中，納入家庭為重要介入單位，例如透過家庭對話工作坊、跨世代協商機制或家庭支持型文化行動計畫，協助家庭成為青年文化實踐的支持者，而非隱形壓力來源。

(三) 在災後重建與地方治理中，肯認返鄉青年為文化與行動主體

研究發現，在災後情境中，返鄉青年常成為連結政策、家庭與部落的重要行動者，協助資訊翻譯、物資組織與文化儀式重建。然而，若政策僅將青年視為「協力者」或「執行者」，而非具文化主體性的參與者，將限制其行動能動性的發展。建議在災後治理與地方發展規劃中，正式納入返鄉青年參與決策與行動設計的角色，使其文化知識、在地理解與跨域能力，能成為地方復原與文化延續的重要資源。

二、社區層面：形塑文化回返「可以被實踐」的行動環境

(一) 建構青年得以「一起回來、一起留下」的同儕支持網絡

研究顯示，返鄉並非單一個體的選擇，而是一種高度仰賴同儕示範與互助支持的社群行動。先行返鄉青年所展現的可行生活模式，往往成為後續青年返鄉的重要參考。因此，社區實務工作可有意識地培力青年社群，支持其發展非正式支持網絡，如青年聚會空間、語言與文化共學社群、行動合作平臺，使文化回返不再是孤立的個人實踐，而是可被承接的集體行動。

(二) 肯認青年的文化行動，而非僅評價其文化純度

研究發現，返鄉青年多透過都市經驗與在地文化的再轉譯，發展多元文化實踐形式。然而，若社區仍以單一、傳統的文化正統性作為評價標準，將可能削弱青年的行動意願。建議社區在推動文化傳承時，轉向肯認青年以當代形式實踐文化的多樣可能，使文化回返成為持續生成的行動，而非被審視的資格考驗。

(三) 打造跨世代對話的日常場域，促進家庭與社區的文化再平衡

研究指出，文化回返得以轉化為穩定行動，往往發生於家庭與社區逐步調整角色期待的過程中。透過日常對話、共作與共學，家庭系統得以重新理解青年角色，青年也能在行動中獲得信任。因此，社區可設計跨世代共學、共作的日常文化場域，使文化回返不僅發生於祭典或特定活動，而是融入生活實踐之中。

總結來說，返鄉青年絕對是文化及社群再現的關鍵力量，當政府正面對少子化、人口老化的雙重洪流衝擊下，更應該正視返鄉青年對原住民社區、社群、家庭穩定發展的關鍵地位。返鄉青年並非單純「回到原鄉生活」，而是在家庭、社區與制度結構中，逐步將文化回返轉化為公共行動的關鍵行動者。唯有當政策與社區實務能同步支持其生活穩定、家庭協商與行

動正當性生成，文化回返方能成為促進原住民社區永續的重要力量。

陸、結論

本文透過對阿美族返鄉青年的生命經驗分析，指出返鄉並非文化回返的自然結果，而是一段需在家庭系統、生活結構與社區場域中，持續協商並透過行動逐步生成的歷程。青年雖在文化認同的召喚下選擇返鄉，承接部落文化責任與情感連結，卻同時必須面對就業機會有限、生活資源不足、家庭角色期待與關係再定位等結構性挑戰，使文化回返成為一段高度脆弱、但同時具有轉化潛力的實踐過程。

本研究進一步指出，返鄉青年並非單純回到原鄉生活的被動承接者，而是文化延續與社區再生的重要行動主體。當青年能在家庭與社區的互動中，逐漸獲得行動的正當性與信任，其文化實踐便得以從個人認同的回應，轉化為被看見、被承認的公共行動。此一歷程顯示，文化回返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回來」，而在於是否具備使行動得以累積與持續的結構支持。

在原鄉地區長期面臨人口外移、產業不穩定與災害風險的脈絡下，返鄉青年的存在尤顯關鍵。特別是在2025年9月發生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事件對當地環境造成重大衝擊之後，返鄉青年的存在更顯關鍵，卻同時暴露於高度脆弱的結構

處境中。這群青年們他們不僅面對資源匱乏、基礎建設百廢待興、就業機會稀缺、農作土地受損，更面對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角力等不利的結構性困境，使之在面臨文化保存、族群共生、經濟維穩更具艱難。災後原住民部落社群的重建不僅需要物質層面的修復，更需透過返鄉青年的主體與投入，透過阿美族年齡階層的社群力量及文化實踐，加上族人集體的部落治理參與，才能落實真正的復原與再現。

（本文作者：陳翠臻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專案助理教授；劉柏傳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花蓮光復中心社工師；曾梅玲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花蓮區主任）

關鍵詞：原住民青年、返鄉、成年初顯期、社區參與、家庭適應

📖 註 釋

註1 Selal，阿美族男性稱呼同階層內的兄弟(不限血親關係)之泛稱。

註2 Patakos，是奇美部落與太巴壠部落之間的傳統儀式之一，部落青年於年祭即將進行之以前以跑步的方式到達對方部落，依循傳統攜帶信物進行口頭傳達，顯示兩部落長久以來的手足情誼並相互報平安、傳遞資訊。

註3 阿美族自稱為「pangcah」（邦查），含有「人」、「同族人」的意思。

註4 阿美族語Aka kapawan, o wawa no pangcah kiso。中文翻譯：不要忘記你是阿美族的孩子。

註5 花蓮縣政府<https://hl.dgbas.gov.tw/StatWebRWD/Page/Default.aspx>，資料引用時間2025年10月28日。

註6 阿美族人稱叔伯輩的男性長者，泛稱Faki。

📖 參考文獻

Ciwang Teyra、黃炤愷、Lahok Ciwko（2022）。〈我不夠格嗎？都市原住民青年內外交困的歧視處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5（3），249-274。

何立民（2006）。《回鄉的家經驗、情感與詮釋——以台東地區25-35歲大專青年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h542m5>

- 曹婷婷（2020）。《島內漂泊記事——臺南都會原住民》。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許木柱（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陳翠臻（2024）。《原住民家長教養壓力下的家庭韌性發展歷程——以花蓮地區育有青少年之阿美族家長為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xz3sg6>
- 傅仰止（1993）。〈都市阿美族的聚居生活型態：以西美社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163-214。
- 黃昱軒（2019）。《魯凱族青年返鄉歷程之探討——以Kucapungane（好茶）部落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a34243>
- 廖慧雅（2022）。《「不要叫我返鄉青年」：國家返鄉政策下排灣族土坂部落之歸屬與掙扎》（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56xp2v>
- 蔡舜寧、李幸長（2025）。〈部落返鄉青年於文化傳承與永續發展中的角色——以電光部落為例〉。《華人前瞻研究》，21（1），19-29。
- 鍾令旋（2020）。《聽見落葉歸根的聲音——一個布農族返鄉自我認同之敘說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656pzv>
-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48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Bowen, M. (1978).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Aronson.
- Phinney, J.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499-514.

附件一 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代碼	性別	年齡	就學 / 就業狀況	離鄉年數	返鄉年數
A	女	23	公部門約聘人員	6年	2年
C	女	24	代課教師	7年	2年
D	男	25	務農	6年	4年
H	女	22	餐飲業 / 返鄉協力	4年	3年
K	男	22	在學	4年	1年
L	男	24	社區組織人員	6年	3年
M	女	24	公部門約聘人員	8年	1年
Z	女	25	服務業	7年	3年

註：為保護研究參與者隱私，本文以代碼呈現個人資料。